

李仙得 臺灣紀行

費德廉・蘇約翰 主編

羅效德・費德廉 中譯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 History

李仙得 臺灣紀行

主編
費德廉・蘇約翰

中譯
羅效德・費德廉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李仙得《臺灣紀行》／費德廉 (Douglas L. Fix)、
蘇約翰 (John Shufelt) 主編；羅效德、費德廉譯。

--初版.--臺南市：臺灣史博館，2013.09

面：公分

譯自：Charles W. Le Gendre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ISBN 978-986-03-8069-9 (精裝)

1. 臺灣史 2. 清領時期

733.27

102018787

李仙得臺灣紀行

主編 費德廉 (Douglas L. Fix)

蘇約翰 (John Shufelt)

譯者 羅效德 費德廉

總策劃 吳密察

指導單位 行政院文化部

發行人 呂理政

行政統籌 謝仕淵 石文誠

出版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臺南市長和路1段250號

☎(06) 356-8889 Fax: (06) 356-4981

<http://www.nmth.gov.tw>

印製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02) 2362-0190 Fax: (02) 2362-3834

e-mail: weitw@smcbook.com.tw

ISBN 978-986-03-8069-9

GPN 1010201954

版次 2013年9月初版1刷

定價 新臺幣1,800元

印刷 皇甫彩藝印刷有限公司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李仙得臺灣紀行

致 謝

本書，《李仙得臺灣紀行》，為英文版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一書的中譯本。英文版已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於2012年出版。編著者 John Shufelt 與 Douglas Fix 當時得到臺灣歷史博物館、南天書局及其專業助理們，還有許多學者、友人、學生等給予極大的協助。在此，不再一一列出（參考英文版），並再次向他們致最大的謝意。

《李仙得臺灣紀行》能順利編譯完成，應感謝許多人士鼎力幫忙。謹將此書中譯期間給予協助的機構與人士列舉如下，以表達我們誠摯的謝意：

首先要感謝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呂理政館長的重視與提出李仙得所著的《臺灣紀行》中譯計畫，並提供經費使此翻譯計畫得以實現。協助此計畫完成的館內相關人士，也在此一併致謝。同時，南天書局總經理魏德文先生，以其專業知識與經驗提供了種種的協助，也在緊要關頭為我們爭取更多時間來完成翻譯與校對的工作。南天書局文字與圖檔美工編輯之黃盈福先生，非常有耐心地整理、編排以及編輯本書。編輯過程中也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見解。

東海大學外文系教授（也是李仙得著作的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一書的編輯）John Shufelt（蘇約翰），為此中譯本撰寫了一篇新著〈李仙得略傳〉，且提供數張相關的寶貴圖像，使內容更為充實有趣。臺灣史專家黃智偉製作新地圖「李仙得福爾摩沙參訪地圖」、增補2012年英文本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所附帶的地圖「李仙得《臺灣紀行》相關地名地圖」、提供新地理與地名訊息、研究舊地名等，

知識豐富，幫忙甚力，是我們要特別感謝的。

彰化師範大學林欣宜教授翻譯3篇導論文章：〈關於文本的介紹〉，〈《臺灣紀行》中的相片〉與〈《臺灣紀行》中的小林永濯畫作〉；又幫忙校對所有的章節，校對註解時亦提供了許多很有用的資料與訊息；同時並協助找專家來幫忙校對、修改部分導論文章與章節。實在勞苦功高，也是我們尤其要感謝的。東海大學外文系林淑琴教授，費心翻譯蘇約翰新文章〈李仙得略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隆志及他組織的讀書會同仁：林欣宜、林文凱、朱瑪瓏、葉爾建撥冗定期聚會閱讀並修改我們《臺灣紀行》譯文的每一章節，更提出相關的資料與寶貴見解。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劉宇珍對〈《臺灣紀行》中的相片〉與〈《臺灣紀行》中的小林永濯畫作〉提供了藝術領域上的專業知識與文詞方面的修潤。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鄭維中、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陳冠妃也為第9章的翻譯做了一些改正。鄭維中並提供不少資料與學術訊息。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鐘玉芳校對並潤飾〈李仙得略傳〉之中文稿。石頭出版社編輯黃文玲小姐提示關於繪畫流派與材質的專業用語。Terry Bennett（中國與日本攝影史專家）提供對5月在倫敦出售的湯姆生（John Thomson）攝影簿中的相片訊息與數位圖檔；我們數年來亦都一直依賴他的豐富知識與攝影收藏。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特藏部門的協助，提供相片的數位圖檔。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室和

地理與地圖部門，提供相片、水彩畫、地圖、素描等的數位圖檔。美國國立檔案館，提供李仙得手繪地圖與原始照片的數位圖檔。已故 Marilyn Langei 女士，提供韓特夫人的肖像。

最後要特別感謝老友，臺灣史學者吳密察教授，對本中譯計畫的主持與多年來的持續支持相助，使出版李仙得著作的計畫得以順利實現。

不過，由於本書涉及的範圍過於廣泛，又匆促成書，加上自己的學養畢竟有限，難免會出現不同面向的疏失，尚請各界見諒並嚴謹賜教為盼。

羅效德、費德廉

2013年9月1日，於波特蘭市

館長序

歷史研究需要借重史料來建構過往的時空脈絡，沒有紮實多元的史料為憑藉，就沒有好的歷史研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作為臺灣歷史為主題的博物館，進行臺灣歷史相關史料及文物的蒐集、整理，並藉由博物館之研究、典藏、展示及教育四大功能，妥適地將這些史料及文物安置保存，因此史料的蒐集與出版一直是本館的重大責任之一。

本館自籌備處以來便積極收集海內外臺灣相關史料，並陸續加以整理出版。在獲悉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手稿資料後，特別與投注長期心力研究、整理此批資料的美國里德學院（Reed College）歷史系費德廉（Douglas L. Fix）、東海大學外文系蘇約翰（John Shufelt）二位教授合作，由二位教授將國會圖書館所藏李仙得1875年所寫〈臺灣記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手稿重新加以抄錄、打字，並附上詳細嚴謹的註解，於2012年3月首次成書出版。〈臺灣記行〉一書出版後，廣獲國內外學術界好評。為了更普及推廣此書，本館於英文版甫出版後，立即著手規劃中譯本的出版。〈臺灣記行〉一書內容牽涉許多臺灣早期的地名、人名，以及專有的動植物名詞，因此在翻譯上有相當困難度，現本書得以順利完成中譯出版，更顯示本書的珍貴價值，也讓人感佩譯者所投注的心力。

本書除文字之外，也完整收錄手稿中所附170多張珍貴照片、版畫、地圖及水彩畫。這些圖像資料搭配文字，能幫助我們對當時臺灣的人文、自然風貌有更清楚的認識跟重構。書中還收錄蘇約翰、費德廉二位教授所寫導讀專文，分別介紹李仙得其人其事，以及手稿中照片及畫作所描繪及呈現的臺灣形象。另外，經由黃智偉先生嚴謹的考訂比對後，將手稿內所載的地名製成新舊地名對照表格，並在臺灣地圖上標示位置；也經過詳細考證，繪製出李仙得歷次臺灣旅行踏查路線地圖。這些地名位置的標示及路線圖的重繪，除方便查考比對外，相信也能幫助讀者更瞭解及認識清末臺灣的地理樣貌。

《李仙得臺灣記行》中譯本得以順利完成出版，特別要先感謝英文版編者費德廉及蘇約翰二位教授，於英文版編輯出版期間的大力支持與協助，同時也感謝黃智偉先生為書中地名考訂及路線圖重繪所投注的心力。中譯本出版過程中，譯者羅效德女士、費德廉教授投注大量的心力，反覆比對琢磨原文與譯文的適切性，完成全書的翻譯工作。另外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張隆志副研究員、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林欣宜助理教授熱心協助校對全書譯文，以及出版本書的魏德文先生，都為本書之完成提供重要的貢獻，特此敬申謝忱。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關於文本的介紹

John SHUFELT (蘇約翰) 著

林欣宜 翻譯

1. 日本的臺灣政策及《臺灣紀行》一書

1875年8月初，當Charles Le Gendre（李仙得）準備要結束他隸屬明治政府蕃地事務局（Bureau of Colonization）裡的辦公室時，他寫信提醒他的頂頭上司大隈重信（1832–1922）¹《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一書尚未完成與出版。該書篇幅頗鉅，有1,600頁的書稿及將近200幀的地圖、照片、圖表、素描和繪畫。²李仙得和他的私人秘書Thaddius Davids（戴維茲）從1874年初開始勤奮地著手籌備此書稿的內容，已經花了一年以上的時間，因此，希望最後能夠結束未完的部份。在信中他的語調似乎帶著一絲不耐煩，或許也隱含著不滿之意，暗示他對上頭處置其手稿不

當的埋怨，而其遲延或許可以歸咎為大隈或官方的延滯所致。「由於我的福爾摩沙旅行記手稿之某些章節及圖片遺失」，李仙得繼續寫道：

也由於不確定它們何時會被找到，考慮到若要再等到重拾這些手稿前可能引發的種種遲延造成的麻煩，我決定要在今日關閉我的辦公室。…這些遺失的章節及圖片，若某天找到了，而且假如它們也回到了我的手中，我便會在歸還給譯者之前完成書稿。³

或許李仙得只是在進行日本之臺灣併吞計畫的同時，對書寫的工作感到厭倦了。在李仙得提到關閉辦公室之記錄前的一年，全力併吞臺

1. 當1874年4月蕃地事務局（譯註：原文為Bureau of Colonization，即「殖民事務局」之英譯）設立時，大隈重信是財相。此處及接下來提及的重要日本官員的背景，參酌了日本國會圖書館提供的線上「近代重要日本歷史記錄」（<http://www.ndl.go.jp/portrait/c/index.html>，2011年7月檢索）。

2. 此書稿有4冊，由皮革裝訂，並註明題名為「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臺灣紀行），收藏於位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會圖書館善本書室中的李仙得文書（Charles W. Le Gendre papers）。全書有標註之頁碼。接下來提及此書稿內容時，會提供冊數與頁碼，如：《臺灣紀行》第2冊，頁122–25。在本書之簡介及之後李仙得的作品內文中提到的參考頁碼，指的都是原書稿的頁碼，並標註於本書之頁緣。

3. 1875年8月8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李仙得文書。大隈於1875年7月27

日接受李仙得的辭職，但此8月8日信函及8月9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中，內容都提到其所著「臺灣出兵的歷史」，因而或許可以合理地將之視為官方文書，因為它們的記載符合辦公室關閉及他的官方任務結束的時間。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李仙得仍持續和大隈保持通訊，而他辭職後的某些通訊內容，仍然與他的官方政策文書提到的內容相仿，但是乃以私人身份提出（又或者是以臨時顧問的身份，針對特別議題所發表的，但現存文書並沒有加以區別）。和大隈通訊中提到關於重大政策的議題的例子，可參考李仙得在1875年10月9日給大隈的部份已出版之通訊信函中，提醒大隈關於北德（North Germany）併吞福爾摩沙的計畫：見Ernst L. Presseisen, “Root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A memorandum of General LeGend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29 (1957): 108–11.

灣的計畫已經取消了。到了1874年10月底，日本之殖民主張的威脅，便已經在和中國外交人員的協調時全然被捨棄了。對於《臺灣紀行》出版的想法和確實的完成日期目前並不清楚，但在1874年6月初李仙得給大隈的信中，通知大隈他已經完成「關於福爾摩沙的手稿結尾」，以及提到書稿已經送交大隈等事，顯示在併吞臺灣（至少其一部分）仍存在可能性時，李仙得對於書稿付出的努力，已經相當程度地開花結果了。⁴《臺灣紀行》的出版在某種程度上與併吞計畫的進行是同時發生的，殖民計畫既然沒有繼續，可能最終阻撓這一部大篇幅著作出版的力道，乃隨著事態發展而加劇了。雖然如此，一直要到次年，出版的計畫才完全被擱置。

在一年之前，李仙得對出版此書的興緻仍然十分高昂。1874年夏末大隈對剛收到之初稿的回應，讓他和戴維茲十分振奮，顯然付出了雙倍的努力持續工作。大隈熱誠地感謝李仙

得對此「圖文並茂」作品的努力，認為應該「可以作為啓蒙盲目大眾與向世人解釋公理正義的原則，因此我認為此書應該儘快被翻譯」。⁵大隈下令的翻譯工作，在英文原稿完成後馬上就開始了，但直到兩人走到人生盡頭，「盲目大眾」都無從得知預備出版的此書之下落。⁶一直要到1899年李仙得在韓國去世為止，他仍保有出版的全稿，也是唯一一部包括地圖、照片、繪畫及相關圖表的版本。⁷

從我們對現存文件的解讀，我們相信李仙得和大隈原來期望，而且至少是李仙得繼續如此希望，能在1874或1875年間出版書稿，但除了之前提到那張1874年9月大隈令人振奮的批准便條之外，我們無法找到任何能夠確實說明出版計畫的清楚聲明，也沒有發現任何文獻足以解釋為何最終未能出版。然而，有關李仙得及當時臺灣與日本前後幾年間的相關歷史研究，以及現有的文獻與出版品卻能讓我們做出些許合理的推論。⁸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在

4. 1874年6月7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我們推測李仙得直到他去世為止所持有的書稿，即為當時要出版的原稿。我們所知現存的另一版本，則是保存於日本的國立公文書館。

5. 1874年9月19日大隈致李仙得信函，李仙得文書。

6. 此一譯本於1998年在日本出版。見《ル・ジャンドル臺灣紀行》，我部政男、栗原純編，複刻版（東京：綠蔭書房，1998）。當我們的工作仍在進行時，Robert Eskildsen從第3冊中摘錄出版了*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 1867-1874: Western sources related to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外國冒險家與南臺灣的土著，1867-1874：1874年日本出征臺灣前後的西方文獻]，臺灣史料叢刊8（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5），頁69-196。但上述出版都沒有包含任何李仙得原有的圖片。

7. 根據美國國會圖書館對李仙得文書所做的使用指南說明，李仙得的手稿及其公開或私人文書的收藏，是李仙得在美國的兒子William Charles Le Gendre於1933年過世後，由其妻子捐給圖書館。當李仙得於1899年逝世後，駐韓國的美國公使

館秘書William Franklin Sands隨即幫忙處理李仙得在首爾的財產，除了將與韓國政府有關的文件留在首爾之外，他將李仙得的私人文書裝船運給William Le Gendre。見“Memo re: estate C.W. LeGendre,” William Franklin Sands (1875-1946) papers, Philadelphia Archdiocesan Historical Research Center (PAHRC), Philadelphia。

8. 討論1873-1874年之間事件相關的歷史書寫，數量十分龐大，但將之詳細列表既不實際也無必要。不過，以下所列本文的討論會利用到的歷史材料，或許可以提供些幫助。見Marlene J. Mayo, “The Korean crisis of 1873 and early Meiji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1, iv (Aug 1972): 793-819; Sandra T. Caruthers, “Anodyne for expansion: Meiji Japan, the Mormons, and Charles LeGend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38, ii (1969): 129-39; 及同作者 [Sandra Thomson Caruthers], “Filibustering to Formosa: General Charles LeGendre and the Japa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0, iv (1971): 442-56; Wayne C. McWilliams, “East meets East: The Soejima Mission to China, 1873,” *Monumenta Nipponica*,

開始的時候，《臺灣紀行》可能是當時明治政府的決策者爲了積極準備1873–1874年間併吞臺灣行動，所做的必要參考情報之彙編。當擴張主義政策的熱度增強，李仙得的書稿出版計畫，也變得更加雄心萬丈。李仙得的龐大筆記充滿著對籌備1874年4至10月間入侵與佔領南臺灣的官員之外交及軍事建議，再加上我們對書稿中幾段極易引發辯論之段落的文本分析，都再再說明了李仙得和大隈後來可能將《臺灣紀行》視爲合理化日本擴張侵略政策及併吞行動完成後的聲明。在日清談判聲明消解了殖民地計畫之後的一年中，李仙得仍持續編纂《臺灣紀行》，顯示李仙得，或許也包括大隈，仍將此工作視爲明治政府與中國及臺灣外交政策的白皮書。此外，因書稿中某些質疑中國對該島主權的極端且刻薄話語，似乎正是在明治官員選擇以談判結束危機、並放棄其殖民地計畫之後，才被撰寫或修訂，李仙得的《臺灣紀

行》被用以預示日本未來可能的主張，以便作爲對中國與條約列強的示警，看來似乎有其道理。⁹

根據Sophia Yen（顏素菲）的看法，以日文翻譯1874年初李仙得所寫的加註備忘錄一事，剛好與明治政府計劃所謂「臺灣出兵」（Taiwan Expedition）的時期相符，也和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李仙得《臺灣紀行》書稿相似。¹⁰ Marlene Mayo則相信這些備忘稿是1873年李仙得給日本外相副島種臣（1828–1905）之報告的擴充版，提供給因征韓論去職之副島的後繼者參考。征韓論的危機使得明治政府在一次可能發生的韓國侵略後分裂，副島因側身於論爭中擴張主義者的一邊，最終在1873年10月落敗後便從政府辭職。¹¹ 這些看法在1877年*The Far East*期刊中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獲得證實。這篇文章是關於李仙得的生平傳記，內容包括了可能只有李仙得本人才能提供給這位不

30, iii (Autumn, 1975): 237–75；以及Edwin Pak Wah Leung（梁伯華），“The quasi war in East Asia: Japan’s expedition to Taiwan and the Ryūkyū controversy,” *Modern Asian Studies* 17, ii (1983): 257–81. 上述研究都清楚地說明了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內部紛爭，如何影響日本與清政府之間的關係，並導致邊疆帝國領土與藩屬國宗主領域相關的領土爭議，而臺灣則逐漸成爲爭議主要地點。即使Mayo也知道日本蠶食或鯨吞臺灣島的目的昭然若揭，但她認爲1874年接著而來的臺灣入侵，扮演了更多「安全閥」的角色，用以紓緩日本國內的不安。正因爲如此，她含蓄地反駁了Sophia Su-fei Yen（顏素菲）在*Taiwan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36–1874* (Hamden: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65), pp. 154–295稍早所提出的看法，並更清楚地反對Leonard Gordon在“Japan’s abortive colonial adventure in Taiwan, 1874,”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7, ii (June 1965): 171–85中所說，因爲日本缺乏經驗與處置之不當，加上英國及美國的干涉，使得此一準備完善的殖民計畫觸礁。最近Robert Eskildsen在其“Of civilization and savages: The mimetic imperialism of Japan’s 1874 expedition

to Taiw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ii (April 2002): 388–418一文中，則重述了此次入侵的殖民目標。他的看法比較有力地在下一篇介紹性的論文中提出：“Taiwan: A periphery in search of a narrativ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May 2005): 281–94；此文收錄於該雜誌4篇質疑臺灣歷史中殖民與邊疆面向的特別專輯中。Eskildsen認爲，應該要先理解被諸如李仙得一樣的外國顧問所唆使與支持的，並透過條約港系統所施行的，國際與帝國主義勢力是怎麼回事，之後才能更深入地了解明治與清政府的帝國建構策略。

9. 見《臺灣紀行》第3冊，第24章〈日本對福爾摩沙的原住民地區是否擁有主權？〉，並請詳見後文討論。

10. Yen, 頁195。我個人較偏好將日本在臺的軍事行動稱爲「入侵」，而非「出征」。「出征」一詞原來爲條約港出版的報刊以及李仙得所使用，而隨後研究此一領域的歷史學者開始借用，也（我相信）經常不加批判地便宜使用。然而，不能否認的是，當使用「出征」一詞於軍事行動上時，無非讓人聯想到企圖以委婉的方式掩飾侵略一事。

11. Mayo, pp. 812–14; McWilliams, pp. 275.

具名作者的個人資訊。這篇文章描述李仙得在副島離職後，開始「將他對福爾摩沙島的筆記依序排列，並撰寫對不同地區的描述」，並證實了李仙得在「1875年將他的辭呈遞給政府的前一天」交了書稿。編輯的註釋提到，書稿內容絕大部份都與仍留存的手稿相同，除了明確提及有包括「超過500幅水彩畫」之外，也暗示比起現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稿，李仙得當時或許正與數量更加龐大的圖像資料奮戰。¹² 這份對於書稿的同時代報告也註明了書稿「文采卓然，但尚未出版」，此點暗示了李仙得對此書的出版仍懷抱希望。或許尚無任何資料比起這篇文章更能夠讓我們知道李仙得對《臺灣紀行》心存何種意圖。除了幾封寫給大隈有關正事的信件以外，在李仙得現存的文書中，並無任何一件曾明確提到此書稿；我們看到的其他相關文獻亦未涉及。

大隈或其他日本官員於1875年夏天當時對臺政策的看法是否和李仙得一樣，並不得而知。由於我們缺乏大隈於1874年9月表示支持以後任何提到此書稿的文獻記錄，顯示當1874年12月初最後一批日本軍隊從島上撤出後，當時所發生的事件，已取代了李仙得所主張的主流立場，並將明治政府領袖們的注意力從臺灣轉移開。雖然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官方文件或其他通訊，足以明確說明為何出版的

計畫被取消了，從上面提到的情勢，我們仍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結論。當日本在南臺灣的軍事行動於1874年的晚春與夏天之間變得沈滯之時，亦是歐美人日益反對此次軍事佔領的力道增加之時。由於對臺的軍事行動造成了比原先期望所能支持的更多經費支出與人力傷亡，戰事引發的疲乏感受與日本國內的不安，也必須一併考慮在內。¹³ 到了仲夏之時，吞併臺灣島的熱情已經全然消褪，到了10月，一連串的高層談判確保了臺灣仍會暫時在清國的掌握之中。¹⁴ 或許我們將永遠無法得知李仙得書稿產生時的確實狀況，或是它被理解、抑或投射的目的，又或者是阻止它最終被政府出版的原因，《臺灣紀行》仍然是對任何臺灣早期條約港歷史、中日關係、或對在東亞的歐美帝國主義有興趣人士的無價之寶。

2. 催生《臺灣紀行》的緣由

爲了要清楚地理解這項出版計畫如何發展，或許值得一提1872–1875年間李仙得擔任日本人外國顧問生涯、以及他早年處理臺灣相關事務的經驗。李仙得在1872年10月底被明治官員聘請擔任顧問，時間點正好在1871年12月間54名琉球漁民在臺灣最南端遭遇船難所引發的一連串外交與政策辯論事件之後。對探討這些事件的歷史學者而言，明治政府想要

12. Mayo, pp. 817–18; Yen, pp. 175–80, 195–97; 351, f.n. 5–7; p. 354, f.n. 50–53; “General Le Gendre,” *The Far East: An Illustrated Fortnightly Newspaper* 3, v (November 1877): 98 及其註腳。根據Mayo和Yen，這些報告大部份的原始英文文本都不存在了。費德廉曾編纂了一份1873–1875年間李仙得備忘錄的編號名冊，作為我們進行這項計畫的研究參考之用，但我們都未曾鎖定其原英語版本。

13. 雖然在南臺灣與原住民征戰中只有大約10多名日本軍人喪命，卻有超過500人在1874年12月日本人最後完全撤退之前的幾個月間的佔領時期死

於疾病。見Paul Barclay,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lonial projects: Anthropological typifi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第2章。

14. 當然臺灣在1895年時變成了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而大隈則在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之後還給李仙得孕育殖民理念應得的功勞。見Hilary Conroy, *The Japanese seizure of Korea: 1868–1910: A study of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0), p. 389.

藉以主張對琉球的主權，並對日益衰弱的大清帝國，採取擴張主義的政策，是很明顯的。¹⁵ 李仙得在1866–1872年間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一職時，就曾與中國政府交涉類似案件，此即1867年3月遭遇船難及謀殺的美國三桅帆船 *Rover* (羅發) 號事件，他並在東亞的歐美外交人員圈子中以臺灣通聞名。在領事任內，他同時也以對中國官員態度積極強勢著稱。¹⁶ 在1872年10月，恰巧在他前往北美途中停留橫濱的一段長達6個月的休假要開始時，他被美國駐日公使 Charles De Long (迪朗) 介紹給急切地想要徵詢他對臺灣相關事務以及與中國政府交涉經驗與看法的日本政府官員，特別是外相副島種臣。根據迪朗所述，李仙得抵達日

本，「帶著極其完備的關於福爾摩沙的海岸、陸地與人民相關的全套地圖、海圖、照片等等」。¹⁷ 隨即日本政府提供李仙得利潤豐厚的合約，希望他留下來在日本外交部擔任顧問。¹⁸ 像他這樣野心勃勃又有才能的人，在美國參議院並未批准他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公使一事後，正覺得被輕忽了，李仙得便於1872年12月19日辭去美國領事一職，隨即接受了東京的職務。¹⁹

他成為日本外交部的顧問後，1873年隨即跟著副島到中國出任務，在那裡他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積極的角色。在副島與他的中國對手李鴻章(1823–1901)首次見面之後，李鴻章反對讓李仙得繼續參與往後的會議，他對

15. 殺害沖繩漁民一事，對日本政府主張擁有琉球群島(沖繩)單純且唯一主權所具有的重要性，可以參考以下所列書目資訊提供之簡潔摘要：George H. Kerr, *Okinawa: The history of an island people* (Tokyo: Tuttle, 1958; revised ed., 2000), 第8章，特別是頁356–60。Leung (頁272–78)則反駁了1874年談判導致了中國主權的事實上讓步的看法，他認為接下來1873年3月一艘小田縣(譯註：即今日本本州南部岡山縣小田郡)日本臣民的船難事件，可以合理地被視為這些談判的主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在1874年條約中不當處置這些『日本臣民』的說法，充其量只能用來指稱這些來自小田縣的日本人，並非琉球人」，頁278。

16. 見《臺灣紀行》第3冊，頁150–384(15–22章)中，李仙得對羅發號事件的詳細敘述。李仙得對臺灣島事務的嫺熟之所以被廣為人知，是由於其他「臺灣專家」都得向他請益、或急於向他報告新發現的關係。例如，密西根大學的自然史學家 Joseph Beale Steere (史蒂瑞)，爲了要收集標本，於1873–1874年間拜訪此島，並於1875年9月27日寫信給李仙得「要求提供關於福爾摩沙的訊息」。見 Joseph Beal Steere papers, 收藏於密西根大學 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 的 Michigan historical collections。同樣的，淡水海關稅務司 Edward C. Taintor (廷得爾)，在參訪蘇澳灣及附近地區時，會讓李仙得知道。見1869年3月10日廷得爾寫給李仙得的信，信中記載了他爲

期10天的拜訪過程，以及另一封1869年9月11日的信函中，提醒李仙得關於他希望能出版的一篇〈該地番人的概略介紹及其語言的略記〉。見李仙得文書。廷得爾著，*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Formosa: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hanghai 18th June, 1874* (Shanghai: Customs Press, 1874)，或許並未及時傳到李仙得手上以便將廷得爾的發現也整合進《臺灣紀行》中，但他曾引用廷得爾1869的地理與人種學上的發現。見《臺灣紀行》第1冊，頁97，註解(1)，(2)；頁111；第3冊，頁419–20。

17. 見1872年11月6日 De Long (迪朗) 致 Fish 的信函(312號)，*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nsmitted Congress, with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December 7, 1874*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4), pp. 553–54.

18. 財務上的動機不應被低估。李仙得的任命可獲得之年薪高達12,000元，幾近他作為美國領事的薪水的4倍。

19. 1872年12月19日李仙得致美國副國務卿信函，美國駐廈門領事給美國國務院的通牒，1844–1906，美國國立檔案館藏(microcopy no. 100, reels 3–6)。李仙得在次日起擔任日本明治政府顧問一職。見1872年12月20日 C[harles] De Long 致美國副國務卿 Hamilton Fish 的信函，“Despatches from U.S. Ministers to Japan, 1872.”

副島抱怨：「我們（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此之前也訂過條約，而且也用不著外國人來指導；那麼現在又為何需要？」²⁰ 日本人方面答應李鴻章的要求，但李仙得仍留在北京繼續指導副島談判策略，同時告知副島在中國首都的其他外國公使館的立場與擔憂。副島到北京公開的理由是去正式批准一項之前已經達成協議的條約，但在談判期間，與韓國、臺灣、琉球（沖繩）群島有關的議題大量發酵。在這樣的情況下，副島十分重視李仙得的專業建議。

副島在政府內部對於征韓論的激烈爭論後，於1873年10月辭去外相之職，當時副島及擴張主義者支持出兵計畫。在李仙得詳盡的情資報告的協助下，明治太政官的軍事與政治領袖們最後將注意力轉而投向1874年初對臺灣入侵或併吞其部分地區的計畫上，李仙得發現自己身在時任財相、也是負責籌畫這些計畫主要人物的大隈之下。在1874年4月發動實際行動的前夕，李仙得被派任至新成立的蕃地事務局，直接聽命於大隈。²¹

李仙得積極編纂書稿的時間，與他深入1874年入侵行動的計畫與執行過程同時發生。首次對《臺灣紀行》有清楚說明的記錄，出現在1874年6月一封他給大隈的信函，信中李仙得提醒大隈將會很快收到一批包含75幀照片的相片簿，已經裝訂成冊，而且，他寫道：「將會用以補充戴維茲先生提議複製的我的臺

灣紀事（原英文為「Notes on Formosa」）書稿。」²² 李仙得在此簡短的記錄中的說明，清楚地暗示《臺灣紀行》出版計畫仍在持續進行，也在稍早之前獲得批准。此事同時也是檢驗該書之出版計畫何時開始籌畫，以及在何種情況下進行的重要線索。雖然「臺灣紀事」或許為書稿之完整書名的略稱，但從李仙得此時仍使用它的簡稱或別名，加上從他的秘書尚未開始謄抄書稿等跡象來考慮，我們可以察知《臺灣紀行》的具體成形的時間點，就在日本出兵臺灣的最初3個月，即1874年4至6月間。到了11月底時，李仙得將「我的《臺灣旅行》（原英文為「Travels in Formosa」）的前3篇文章」轉發給大隈，並再度於12月底時，將包含寫著「我的《臺灣紀行》（原英文為「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後續」的說明信給大隈，這是在他所有的文書中第一次出現現存書稿的全名。²³

到了1875年6月，李仙得向大隈報告書稿幾乎全部完成，並寫著：「我很榮幸能獻給閣下我的臺灣紀事書稿的最後剩餘部份」。他並要求將英文原稿退還給他，以供最後編輯工作，並讓他插入「照片與日本藝術家所繪製的圖像、以及地圖」，全部都收入書稿的最後版本。²⁴ 雖然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但最後仍未付梓。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保存有英文版與日譯版，然兩者都不包含插圖，這無疑顯示那些最

20. 見McWilliams引文，頁248。李鴻章擁有眾多的身份，當時他的官方職稱為總督（即兩江總督，李仙得的稱呼為「Viceroy」），但他實際上也是清政府的外交部長。

21. 李仙得的正式任命與蕃地事務局（殖民事務局）的授職是在1874年4月7-8日。見1874年4月7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及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大隈重信關係資料（以下略記為：大隈文書），文獻編號C431。

22. 1874年6月5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此一照片集現藏於東京的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該館的善本書特藏包括一本書背上題名為 *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 的裝訂本，但書本內外都不含任何其他文字。不管在尺寸、裝訂材料、書背題名的金箔字體等方面，這本書都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4冊《臺灣紀行》完全吻合。

23. 1874年11月28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及1874年12月31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收錄於東京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福爾摩沙記錄」〔譯註：原文為フォルモサレコード〕。一份相同的文件也存於早稻田大學大隈文書，文獻編號C482。

24. 1875年6月7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

初「錯落的章節與圖片」，畢竟還是找到了，並交至日文譯者的手上。因此李仙得始能完成那本唯一有插圖版的最終編輯工作。此版本倖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李仙得文書中。在東京現存的英文版及日譯版書稿都不包含圖像資料一事，也成為旁證，間接證實了《臺灣紀行》的出版計畫在1875年夏秋之間已經完全停擺。李仙得辭職後與大隈的信件往來中，沒有再度被提起。

找出李仙得書寫計畫的大致「完成」時間，並討論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稿的地位，比起試圖推測作者及其工作人員產出書稿卻不出版的原因，要來得簡單得多。在1874年12月底，李仙得提供給大隈「臺灣紀行副本的後續」一事的記錄，也提到他「在某些頁面仍留有空白處，這些地方會在未來以附有清楚文字說明的圖表填補」。²⁵ 因為這些圖表被收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版本中，此一便條的內容顯示李仙得已經完成書稿付梓之前最後的準備工作。雖然在李仙得所有現存版本的書稿中的原始註腳仍存在幾處空白處，我們仍可合理的推測，直到李仙得死前所隨身持有的版本，已經是幾近完成、可以出版的狀況。

大隈要到1874年9月19日才回覆李仙得6月的信。這幾個月間，正是殖民計畫的關鍵決策時期，自然會影響大隈及其他官員對此書價值的看法。1874年夏天的大部份時間，最晚到10月間，隨著日本在臺灣的出兵行動，日本和中國來到戰事爆發的臨界點。除了對於日本人的軍事能力是否能夠支持這樣的戰爭的

質疑大起，日本人也對英國與美國對其軍事行為日益增加的抗議猝不及防。到了7月底，因有這些分心的事、再加上對日本無力戰勝中國的恐懼，讓大久保利通（1830–1878）及其盟友大隈等人所領軍的新政府，感到對臺殖民一事不能任意地進行。²⁶ 除此之外，1874年8月6日李仙得被駐廈門的美國領事館（在反對李仙得涉入日本出兵臺灣行動的美國外交人員唆使下）附屬的美國海軍逮捕一事，則是極其重要的插曲。雖然日本人發動官方抗議李仙得被逮捕的行動，而雖然美國國務院發現無法構其入罪，而使李仙得在他抵達上海後被釋放，這次事件卻必然使得李仙得在明治政府高層中的聲望被貶抑了。當李仙得發覺到此點，就花費了相當精力證明他的清白，並試圖將事態發展拉回軌道。²⁷

雖然發生了這些意料之外的外交阻撓，也不管此次事件引發的危機最後如何解決，大隈似乎認識到了《臺灣紀行》的宣傳價值。我曾在前面提過，最初此書之出版可能計劃要和日本成功地完成對臺灣的入侵與殖民事業同時發生。然不管明治帝國可能據此宣稱在其最南端獲得多少領土，《臺灣紀行》也可能是為了「向世人解釋公理正義的原則」，而具有價值。然而，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了1874年7月底，明治政府決策者內部雖已達成共識，認為與其中國交戰，不如在殖民計畫上妥協，²⁸ 然併吞番地一事並未被全然捨棄，而是作為與北京的中國外交官員談判的籌碼。若此危機演變為全面開戰，對臺灣南部及東部的殖民雖仍存有

25. 1874年12月31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26. Gordon, pp. 177–81. 雖然Mayo（頁817–18，註87中）詳盡地解釋，顯示她的看法與Gordon所說殖民計畫是一場「失敗」的結論大為迥異，但她也承認政策的轉變，特別是大久保（和李仙得所支持的副島及其他強硬派的擴張主義者不同）有可能會為了提升日本的聲望及作為與歐美列強

的談判籌碼，而不惜一戰；但他還不會單獨要求取得領土而已。當時這些列強也使日本歸屬於跟中國同樣的條約港體系之下。

27. 除了大隈及其他官員在接下來幾天收到一連串關於李仙得被補的電報外，李仙得在兩封長信中詳述了他對事件的說明。見1874年8月6日及1874年8月28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

28. Mayo, pp. 230–39.

疑慮，但依舊被視為戰爭可能的結果。大隈及其同僚此時已準備面對所有可能性。

3. 李仙得和副島種臣

雖然《臺灣紀行》是在李仙得從1874年初到1875年7月辭職期間聽命於大隈時所孕育並編纂的，但我相信李仙得早期與副島種臣的接觸，發揮了重要的影響，並提供我們為何此書終究未能出版之原因的進一步線索。就在他於日本任職的第一年間，從他於1872年10月抵達日本開始，²⁹到1873年10月副島辭職之間，李仙得琢磨他對日本之對臺政策的想法，並開始著手撰寫主張入侵與併吞的長篇備忘錄。副島是這些政策宣言的主要對象，也是注意傾聽並敏銳的讀者。如果我們同意Wayne McWilliams的說法，那麼，不難發現在明治精英中，副島既是主要的領導知識份子、也是政府中推動帝國建構最重要的人物。³⁰確實，不純然是許多歷史學者的猜測，李仙得是首先在明治政治領袖腦中植入擴張主義種子的人，Marlene Mayo認為是副島首先採取了侵略的立場，鼓舞了李仙得得以對更大規模的可能性發揮想像力。她寫道：「當他開始進入狀況，[李仙得]把臺灣的漢人聚落、海岸的中國城市廈門及韓國列入日本應該擴展並宣揚教化的區域。」²⁶

對李仙得來說，副島是他首次、也是職業生涯中唯一一位在野心及看法上惺惺相惜的知識份子同僚，更是一位至少握有足夠力量將他們共同的想法執行到底的決策者。現存有關李

仙得和大隈意見交換的記載，比紀錄李仙得和副島的直接溝通的文獻更多，此事實無疑讓我們對李仙得與這兩位明治領袖之間關係的理解易生誤解。從李仙得離開其職位後3年出版的*Progressive Japan*（《進步的日本》）來看，李仙得在書中大篇幅重述副島的擴張主義政策，³²主張之前首相的政策若能貼緊原先的設想，就可以同步地強化帝國，也可以緩解不安之武士階級的影響：

副島先生相信武士階層和外國人兩方都太過強勢，以致無法以政府希望之間接的方式處置；而他害怕，除非可以讓[武士們]明顯感覺到，他們被要求致力於重建工作所付出的努力，會比起加諸在他們身上的具有不確定性的期待，更加地有利可圖…否則他們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威脅性。³³

李仙得將1874年新政府進行的「臺灣出兵」，標誌為「一項妥協的計畫」，而儘管他承認這項計劃強化了「日本在亞洲之旗幟的聲望，增加陸、海軍及外交工作的經驗」，他同時也明示了大久保政府搞砸了他和副島原先於1873年非常努力進行的計畫之初衷。

不管是《進步的日本》一書、或其他我們見過的文件中，李仙得對大隈只有表現出崇敬。李仙得認為大隈是有力的支持者，進入1880年代仍持續培植與大隈的連繫，不斷給大隈和他的家人送上昂貴的禮物與恭敬的問候。³⁴但他們僅能說是職業上的公事關係、而非親密的同志。在《進步的日本》一書中唯有

29. 直到1872年12月19日李仙得才辭去美國領事一職與擔任日本人顧問，但從他1872年10月底抵達東京後，曾與副島及其他政府官員有過一連串密集的討論。

30. McWilliams, p. 245.

31. Mayo, p. 802.

32. 參見Charles W. Le Gendre, *Progressive Jap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needs of the empire (New York and Yokohama: C. Levy, 1878), pp. 94–103.

33. 同上書，頁95–96。

34. 1881年3月15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早稻田大學大隈文書。

一次提到了大隈，是在一處註腳提到了大隈創設三菱企業的功勞，而大隈於1909年出版的兩冊回憶錄中，卻沒有提到關於李仙得的隻字片語。³⁵ 對照來看，反而是李仙得和副島則在彼此共同野心的基礎上，發展出相同的意識型態。

薩摩藩的擴張主義武士所支持的副島，早在李仙得到來之前就對臺灣投注了關懷的眼神，此事在歷史學者之間沒有太大爭議。³⁶ 但到了1873年初李仙得所掌握的臺灣最新情報及他逐漸加強的侵略建議，對於擁有相同想法的上司來說，則達到了加乘的效果。1873年2月17日，副島要求大隈將以下訊息傳給首相三条實美（1837–1891）：

我對於藉由談判取得福爾摩沙南部有十足的信心，假如那就是我們所想要的。要接收全島，我們也許必須訴諸武力，但在這個時間點尚難以決定。假如我們現在只取南部，我認為，透過外交，我能在四至五年內取得全島。³⁷

此項建議與李仙得的策略非常接近，因此也很可能是由李仙得提出，而非副島。或許的確是如此，Mayo和McWilliams似乎都認為副島和李仙得彼此惺惺相惜，是野心勃勃、彼此互相鼓舞進行更大規模與龐大計謀的擴張主義份子。

當「征韓論」危機發展到最高潮，導致副

島於1873年底去職時，李仙得在一封給美國海軍上將Daniel Ammen（艾門）的信中，表現出他對副島關於朝鮮與臺灣之立場的清楚支持。在同一封信中，他也聲明在此政策危機後，他之所以能仍在官方顧問的位子上，可以歸功於副島的努力周旋。然而最終外交部仍遵循李仙得在1872年底提供給副島的「第四號備忘錄」內容，認為應訴諸「一項採納外交政策的計畫」，³⁸ 其中便包含了入侵與佔領「福爾摩沙番地」的計畫。雖然新的領導人最終仍同意並準備全島殖民的計畫，但即使這個可能性真的實現，比起副島於1873年2月給三条的訊息中所展露的，也是勉為其難、熱情大減的。

Hilary Conroy分析入侵臺灣的計畫，就「如同征韓的陪嫁。它擱置至十月危機之後」，但大久保帶領的新政府「深知它為不安的武士精神帶來轉移注意力的可能性」。³⁹ 李仙得仍是重要的明治領袖所信任的知己，但實際執行與組織1874年由李仙得在副島任內醞釀的入侵南臺灣計畫的官員們，把國內安定的重要性看得比帝國建構來得重要。他們如此的小心翼翼自然有其道理：即使在1874年入侵計畫終於成形，大久保時任內務大臣，在1873年10月總職之後，發現自己必須面對平定1874年2至3月間由「征韓」的失意武士引發的佐賀之亂。大久保自己是武士出身，參與了此次征戰，在其生涯中既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面對了戰火。⁴⁰ 他及同僚平安度過此次危機，而在他帶進政府

35. Charles W. Le Gendre, *Progressive Japan*, p. 101, 註17; Ōkuma Shigenobu,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Marcus B. Huish, ed.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909).

36. 見Paul Barclay, "Japanese and American colonial projects: Anthropological typification in Taiwan and the Philippine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9, 在第2章中他檢驗了日本在李仙得與明治政府接觸前後所收集的情資。

37. McWilliams, p. 243, 引用自其英文譯文。

38. 1873年12月7日李仙得致Ammen（艾門）的信函，收藏於Daniel Ammen Papers, Collection 811, Special Collections, Young Research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39. Conroy, pp. 53–54.

40. Sidney Devere Brown, "Ōkubo Toshimichi: Hi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licies in early modern Meiji Jap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ii (February 1962): 183–97. Brown暗示大久保取代

的官員中，被歷史學者認為是「熱心的西洋論者…及門徒」之領袖的大隈重信，任職於大久保之下。⁴¹因此，從1873年10月之後，李仙得發現自己身處於更加謹慎避免將日本曝露在外交探險危機的領導人之下，同時，在李仙得對艾門提到的首次評估中，他也認為這些領導人比較無力於處理被李仙得所描繪的「這片土地的亂源、即騷亂的武士階級」，亦即日本近來被剝奪往日特權的武士貴族，所造成的國內不安。⁴²

明治時代那些早期的領袖，他們渴望在提升日本的國際聲望之際，同時又能維護脆弱的國家內部，使之穩定，而殖民方案正是其所尋求之眾多可能策略之一。這些策略間有時尚相互矛盾。然可確定的是，李仙得在其主張併吞政策的立場上從未動搖過。就在1875年7月，他辭職後的兩個月，李仙得寫信給大隈：

我相信日本在亞洲的利益，自我建議取得朝鮮與福爾摩沙以來，並未改變，對日本來說，它可能是最有利益的結果。我仍然相信，如果當時在預期的情況下這個方案曾被進行了，它將會成功。⁴³

李仙得的想法從他與副島接觸以來，一直沿著擴張主義的軌道繼續，而其具有侵略性的立場，並沒有因為中國補償1874年12月20日日軍力從島上完全撤出所需，而有所稍減。⁴⁴有證據顯示這樣的強硬路線塑造了《臺灣紀行》一書（假如它真的被出版的話）中最具政治緊張性格的篇章。我們有理由相信正是這樣的可能性，或許便是阻礙出版的主因，甚至是關鍵性的因素。

副島成為明治最具主導性的政治人物，即使他們登記之部會職掌並非如此。

41. 同上，頁184。

42. 1873年12月7日李仙得致艾門信函，Ammen papers, UCLA.

在《臺灣紀行》中具爭議性的第24章，〈日本對福爾摩沙的原住民地區是否擁有主權？〉，李仙得引用美國從西班牙手中併吞佛羅里達、法國割讓路易斯安那領地、及從俄羅斯手上買下阿拉斯加等前例，預測隨著正式併吞該島的原住民地區，清政府有可能會希望「割讓她島上的領地」，以避免與日本產生更進一步的衝突：

不管中國對割讓她在福爾摩沙上的領土給日本的最後結論為何，在日本佔領原住民部份土地後，併吞全島只是時間和如何進行的問題。在中國旁邊有著這個強壯、勤勞、好戰的鄰居，中國將難以再好整以暇地享受持有該島的好處，就像西班牙要保有佛羅里達一樣；而若中國愈晚決定割讓，其價值就會變得越薄弱，因而能換取的金錢也就會更少，而當她察覺之時，則顯然已經太晚，將無法再維持而最終將會被迫出售〔臺灣〕。⁴⁵

第24章可能是在李仙得於1874年8月出版《福爾摩沙番地是否為中國帝國的一部份？》小冊子之後不久所寫、或大篇幅修訂的。這本小冊子帶著無意中顯得嘲諷的副標題，即「對此問題的一項不帶偏見的聲明」，是對中國的臺灣政策的一次劇烈攻擊，而且是由一篇1874年7月18日刊載於中文報紙譴責日本對該島軍事行為的文章所引發。在小冊子的緒論部份，李仙得提供了這篇文章的英文翻譯，題名為〈依李仙得的翻譯〉〈在福爾摩沙的日本人〉，然後將中國對該島的製圖成果奚落了一番，即「顯示出對地方沒有任何認識的情況下，肯定

43. 1875年10月9日李仙得致大隈信函，李仙得文書。

44. Yen, p. 284.

45. 《臺灣紀行》第3冊，頁401。